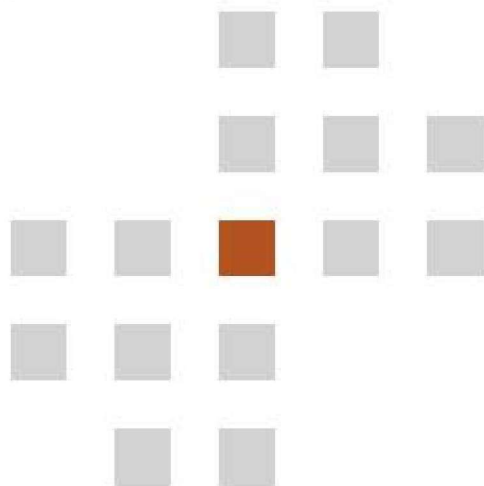


一个离任纪委书记 的反腐败观

YIGE LIREN JIWEI SHUJI
DE FANFUBAI GUAN

燕 秦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一个离任纪委书记的 反腐败观

燕 秦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腐败是对公平的戕害，对正义的践踏，对权力的滥用、私用。本书记录了一个曾经在反腐败战线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对中国反腐败问题的思考。其中既有对反腐败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又有对现实腐败滋生原因的深刻剖析，还有一些用随笔、杂文表达出的作者对反腐败问题的忧思和期望。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已成为兴党兴国兴军的大事。作者的思考对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离任纪委书记的反腐败观/燕秦著.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667 - 1235 - 6

I. ①一... II. ①燕... III. ①反腐倡廉—中国—学习—参考资料 IV. ①D6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6228 号

一个离任纪委书记的反腐败观

YIGE LIREN JIWEI SHUJI DE FANFUBAIGUAN

作 者: 燕 秦 著

责任编辑: 向绪初

印 装: 湖南省誉成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6 开 印张: 18 字数: 295 千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7 - 1235 - 6

定 价: 30.00 元

出 版 人: 雷 鸣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 - 88822559(发行部), 88821264(编辑室),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 - 88649312(发行部), 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xiangxc@hnu.edu.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 请与发行部联系

自序：猫好不好，不能问老鼠

腐败，是一种古老的罪恶。它与人性中的贪欲，与政治生活中的公共权力，与经济生活中的商品货币，与社会生活中的竞争是相伴而生的。

对于什么是腐败，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腐败就是权力的滥用。这个说法简明、扼要，而且抓住了要害，但我觉得它不够全面，不够精准。我给腐败下的定义是，腐败是对公平的戕害，是对正义的践踏，当然也是对权力的滥用，严格地说是公器私用。这个结论，是建立在我的工作研究和实际经验之上的。

2000年6月至2005年底，我担任张家界市纪委书记，在这个岗位上干了5年多。其间，我曾因为此期间和此前在反腐败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得到中央纪委领导同志的认可，还一度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五组，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身边工作过短暂的时间。

此前，我在湖南省纪委办公厅和调研室工作过7年多（1993年—2000年），主要从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工作研究，为省纪委主要负责人做文稿服务。在这段时间内，我完成了一些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段内产生过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

再此前，我在常德地委、市委政研室工作。出于对公平正义的渴求，当然也出于对腐败的憎恶，我曾写过一些关于反腐败的文章，发表过一些关于反腐败的言论。这些文章和言论，大都是基于理性和良知的独立发声，当时显得比较尖锐甚至有些另类。我因此承担了一定的压力。

应当说，我们党的性质、宗旨与腐败是水火不容的。我们党反对腐败从来都是旗帜鲜明的。但我们党对反腐败的判断，也有不够准确的时候；我们党开展的反腐败的实践，也有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有时候表现为雷

声大、雨点小，有时候则表现为隔靴搔痒，有时候还表现为抓而不紧。

监督与被监督、腐败与反腐败，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说贪官污吏是老鼠，那么，反腐败的专门机关和人员就是捕鼠的“猫”。我的观点是，不论什么政治体系下的反腐败，猫好不好，都不能问老鼠，而应当问猫的主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鉴于党内腐败多发高发的严峻形势，也鉴于党内政治生态不正常的严峻现实，以雷霆手段反腐败，积极治标，努力为治本赢得时间，党心军心民心为之一振，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戴。要我说，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是真心实意、真抓实干的，是成效卓著的，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度认可的。

曾几何时，国际国内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当今中国反腐败，真反会亡党，不反会亡国。我不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的危言耸听，它不过是一种忧国忧民忧党的痛切之声。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只有真心实意地、卓有成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才能兴党兴国兴军。否则，中国共产党将会不打自倒，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和进步将是病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只能是一个口号，如果长此下去，中华民族将可能在病态的繁荣中走向万劫不复的灾难。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作为一个离开纪委书记岗位将近 10 年的领导干部，作为一个即将退休的国家公职人员，也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把自己以前关于反腐败的一些思考、一些看法、一些主张结成一个集子予以出版。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和主张，与现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还是比较契合的。希望这本书对我们反腐败的斗争有一些参考的价值。如果能如愿以偿，这将是莫大的欣慰。

目 次

警钟长鸣：执政党的党风不正，中国就没有稳定可言	1
论政治腐败	19
向中央纪委、监察部直陈己见	39
论党务公开	61
反腐败论纲	68
要树立科学的监督观	81
领导干部应该大力减少应酬	89
关于反腐败的超现实思考（一）	99
关于反腐败的超现实思考（二）	107
关于反腐败中两个问题的看法与建议	118
中外反腐败斗争的异同分析	127
努力建设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道德	130
“灰色收入”：加强和改善干部监督工作的一个重要视角	133
在执纪执法中如何认识和处理能人“中箭落马”的问题	139
论贿赂	149
关于廉政问题的辩证思考	154
论经济建设与惩治腐败	159
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有效地惩治腐败	173
吃喝风屡禁不止探源	179
深入反腐败必须把政治讲透、把发展讲够、把职责讲清	184
下一步反腐败需要注意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	193
反腐败斗争如何深入	199
廉洁自律与车子、房子、票子、筷子问题	208

组织工作杂谈	215
科学的遗憾	230
“世风日下”当由谁说	233
也谈培养一个领导干部不容易	238
衷心地祝愿：领导人每月题词少一些	241
公家的悲哀	244
洋洋洒洒说潇洒	247
有缺点的能人当如何用法	253
领导干部要少搞“卡拉”，多得“OK”	256
猴·鸡·老虎·苍蝇	259
要警惕不廉洁的人受到重用	262
猫与鼠	264
骆驼·耕牛·蚊子	266
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 努力做一个称职的纪委书记	268

警钟长鸣：执政党的党风不正， 中国就没有稳定可言

(1991年3月)

报告和抵制腐败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责任；
漠视和容忍腐败是一种背叛，也是一种罪过。

——作者题记

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动乱中发展，更不可能在动乱中起飞。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政治常识和历史常识。

1989年春夏之交，在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的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暴乱。当时的情形让国人撕肝裂肺，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这场暴乱，直接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不说，还极大地影响甚至一度中断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它对于中国社会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目前以至将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会消失。

中国社会还有没有再度发生动乱的土壤和条件？唯物主义毕竟不是算命先生，要对此下结论，就得从当今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出发，深入考察中国的现实。

威胁中国社会稳定的头号炸弹

稳定和发展，是当今中国的两大主题。以此为着眼点，“越过”和“通过”现实来观察客观的中国社会，就不难发现，在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的世界背景下，正处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影响着社会稳定的因素有很多。从主要方面来讲，至少有五大因素：一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改革十二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曾几度泛滥。1989年春夏之交的暴乱被平息之后，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由高潮变成了潜流。这股潜流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汇合在一起，就像一个幽灵，将继续威胁着中国社会的稳定。二是执政党的党风问题。近些年来，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执政党内部的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在一些地方和领域甚至有相当程度的蔓延。三是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正在激起越来越多人的抱怨和不满。四是在改革开放中，由于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和利益关系的剧烈调整，人们原来的精神支柱断裂了，而新的精神支柱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仰散失和信念崩溃，表现出比较普遍的信仰危机。五是劳动就业问题日渐突出。现在全国有上千万城镇青年待业，在职工中有近 2000 万人隐性失业。在尚未进入政府就业视野的八亿农民中，有上亿劳动力处于就业不充分状态。这些无疑都是一枚枚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炸弹。除此之外，市场疲软、社会治安形势严峻也都威胁着社会稳定。这一枚枚社会炸弹在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各自处于什么位置？通过一番分析，一个结论就会自然地凸现出来，执政党的党风不正，是威胁中国社会稳定的头号炸弹。其理由如下：

第一，执政党的党风不正，在诸多的社会炸弹中带有高度的综合性和相关性。每个社会问题，固然有着复杂的原因，可能涉及和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主要表现在某个领域。像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主要表现在思想领域；社会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劳动力过剩，就主要表现在劳动就业上。而执政党的党风不正，则会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都会受到它的影响，而且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和消化都与执政党的党风直接相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是要民主、要自由、要搞私有化吗？如果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做得好，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确实表现出了比资本主义更多的优越性，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一套主张显然就不可能有市场。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提出要民主、要自由，我们的执政党能给人民群众比任何制度都切实的民主和自由，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也就无以立足了吗？再讲社会分配不公，如果我们的分配机制是合理的，能把收入差距限制在努力的差别和贡献的差别上，放在人民诚实劳动的基础之上，没有或少有因党风不正带来的钱权交易，没有执政党的政策不合理的因素，社会分配不公也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解决分配不公也不会有如此难度。同样道理，其他种种社会问题也与党的不正之风有程度不同的关

联。如果我们的党风好，各种社会问题都不会演化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即使在所难免，解决的难度也要小得多。

第二，执政党的党风不正，在诸多的社会炸弹中具有明显的主体性。社会问题，就是来自于社会本身的，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危险性的问题。尽管它与政治、经济体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相对于执政党来说，基本上是属于客体的东西。像劳动就业、社会治安这类问题，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一定时期的客观存在，与由谁执政、实行什么社会制度有一定的联系，但联系并不是直接的。相反，执政党的党风问题，从社会的角度讲，是社会问题；但严格说来，是政治问题。由于它是执政党本身的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主体性。如果说执政党着手解决属于客体的社会问题，是改造客观世界，那么执政党解决自身的问题，则属于改造主观世界了。改造客观世界，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力，是比较容易的；但要解决自身的问题，则要难得多。就像是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给别人做手术的成功率可能很高，但如果为自己做手术则要困难得多；也就像一个理发师，他可以给别人把头理发得很顺手，叫别人很称心，但如果为自己理发，就难得顺手，更难得称心。

第三，执政党的党风不正，在诸种社会炸弹中具有强烈的辐射性。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方位的领导，既有政治方面的领导，又有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的领导；既包括宏观的领导，又包括中观、微观的领导；既有对机关、工厂、学校的领导，又有对农村村组的领导。它的这种全方位的领导地位，使得它自身的不正之风带有极强的辐射性，或者说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它在政治上的不正之风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很快就会蔓延到全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它在经济上的不廉洁如果得不到及时控制，很快就会弥漫于经济生活的广阔领域；它的任何一项决策失误，也会很快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效应，就叫作“北京打喷嚏，全国患感冒”。君不见，党的领导人肯定“机关搭台、企业唱戏”，全国各地的官办公司便犹如雨后春笋。执政党的党风不正带来的这种“辐射效应”，往往是我们的执政党始料未及的；治理起来，也往往有些措手不及。还应该看到，执政党的党风不正，在诸种社会炸弹中，往往充当“催化剂”和“点火器”的角色。其他社会问题危害社会稳定，也往往以执政党的腐败和决策失误为口实，抑或以此为导火线、突破口。这种教训，在世界政治史和中国政治史上

并不鲜见。

执政党的党风不正在各种社会炸弹中的这种综合性、相关性、主体性和辐射性，在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暴乱中曾得到过充分的验证。大家知道，1989 年的学潮→动乱→暴乱，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平息难度之高，举世罕有其匹。为什么？有人说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泛滥的结果，也有人说是少数“长胡子的人”幕后操纵的结果。这些回答无疑都没有错，但并不是答案的全部。如果说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结果，未免夸大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力量，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靠要民主、要自由、全盘西化的主张，绝对激不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如果说这是少数“长胡子的人”幕后操纵的结果，就更是悖情理的。我们并不否认在学潮、动乱的背后有少数人的操纵，但是在制止、平息动乱的人群中，长胡子的不是少数，而是一大批。幕后长胡子的可以“四两拨千斤”，幕前长胡子的却千斤拨不动千斤，岂非咄咄怪事！

平心而论，这场暴乱的确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有直接关系，与各校社会炸弹的集中有直接关系。但是如果不是执政党的种种腐败因素掺和进去，没有执政党的腐败为自由化势力提供“打倒官倒，反对腐败”的口实，学潮根本就升不了级，暴乱就无以形成，即使形成了，平息起来也不会如此之难。

头号炸弹的“爆炸当量”

陈云同志早就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 1989 年平息暴乱后不久与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曾严肃指出：腐败问题不解决，三个月的安定也没有。来自执政党高层领导的反复告诫，绝非“狼来了”的寓言，更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来自高度理性的权威论断。他们的这些论断，就说明这枚头号炸弹的爆炸当量是相当巨大的。尽管这些论断也常为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所引用，但其警世作用实际上已在庸俗化的引用中大大地减弱了。为什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这枚社会炸弹的爆炸当量缺乏深刻的认识，缺乏一种应有的危机感。要使我们真正建立起必要的危机感，就有必要对其爆炸当量进行一番具体的剖析。

党风不正，民心不顺。到今年中国共产党已诞生七十周年。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从“地下”到“地面”，又从在野到执政。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以廉洁为民的共产党取代了腐败的国民党，以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新中国。因此，共产党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戴，人民有一种质朴的翻身感，真心诚意地跟共产党走。“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这是人民群众的心声。正是靠着人民群众的拥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日渐巩固。就是党犯了错误，包括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人们还能够原谅。但是近些年来，由于党内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党风建设在“根本好转”、“稳定好转”、“明显好转”中不见好转，人民群众对党内不正之风的意见越来越大，对共产党的尊敬越来越少了。有些地方可以说是民怨沸腾。人们把这种不满内化为一种消极情绪：普遍的精神沮丧，人们觉得干什么都没劲。相当一部分人开始怀疑我们有些共产党人的真诚，开始设法逃避做出自己应当做出的一份贡献，表现为大面积的消极怠工。而这种大面积的怠工造成的危害，比任何剧烈的罢工造成的损失都大得多，也难以治理得多。

党风不正，改革不成。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这个结论，无论持什么政治见解的人都是赞成的。尽管人们关于改革的主张各不相同，但其改革的主张都以此为起点。全党全国的这个共识，应当说为改革创造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但在党风不正的情况下搞改革，不是凝聚不到推进改革、振兴中华的雄才大略，就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中国这么个泱泱大国，要通过改革摆脱落后，走向中兴，需要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但在党风不正的情况下，有的人任人唯亲，搞关系网，使人才无法脱颖而出。各类人才的利用率很低，整个民族的“能”转化为“功”的比率更是低得可怜，与之共生的是种种奇异现象：一方面是人才奇缺，另一方面是众多的人才的能量得不到释放；一方面是众多人才“英雄无用武之地”，怀才不遇，另一方面是众多的平庸之辈在重要岗位上滥竽充数，误国误民。一方面是人才出头难，另一方面是人才出头后又出现可怕的蜕化。一些人才，在出头之前，有较大的抱负，可是一戴“乌纱”腿就软。有的人才出头之前还雄心勃勃，励精图治，但一旦取得一点成绩，就开始走下坡路，或平庸下去，或腐败起来。一方面是货真价实的人才缺乏，另一方面是种种冒牌的持有假文凭、假职称的人才异常的多；一

方面是真正的人才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则是那些危害事业的邪才招摇过市；一方面是高价从外国聘请人才，人才行情大涨，另一方面是“三个诸葛亮，顶不了一个小皮匠”。就是被称为社会良知和精神载体的知识分子，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也有人缺乏对历史负责、对真理负责的勇气，不敢进披肝沥胆的诤言，不敢配制苦口涩舌的良药，对中国的政策，缺乏具有战略眼光的气魄，使改革常处于一种“撞击反射”、“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再说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歪嘴和尚也往往把经念歪。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你说要干部管理权限下放，就有人拉开架势猛提干部，制造官员大裂变。你要评职称，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他就制造假文凭、假论文、假档案、假职称，叫你“假作真时真亦假”。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管用，立刻就有人给你造出假的来。你说要引进竞争机制，就有人把赛学习、赛才能的社会选择搞成赛门路、赛关系，使优胜劣汰颠过个儿。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更是如此。你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他就打破你的全国一盘棋，搞“诸侯经济”；你要提出“包”字进企业，有的企业负责人暴富后就拍屁股走路，企业却垮了。你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他就给你搞权钱交易，敲诈勒索，行贿受贿；你要搞双轨制，他就把双轨制搞成“搞鬼制”，搞得倒谷满天飞，官倒、私倒、军倒、民倒沆瀣一气，大发其财。你提倡搞横向联合，结果搞成“横竖要喝”。一些高级“食客”尝遍山珍海味，吃尽飞禽走兽，经常喝得红光满面，被讥为“酒染的风采”“酒精考验”。

党风不正，开放不能。中国要改革，要搞现代化，闭关锁国的路是走不通的。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和现代史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党风不正的情况下，要打开国门，让国人睁眼看世界，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管理经验，却往往会使西方文化的腐朽因素和中国封建糟粕胶着在一起，生出许许多多的怪胎来。比如：西方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人生观和中国的封建特权意识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资产阶级的那种以奢华和挥霍为标准的社会交往、以昂贵和奢华为标准的各种聚会、那种不惜巨大浪费以制造豪华气氛的腐朽作风泛滥成灾。中国还很落后，还远远没有达到现代化，但一些党政要员的衣食住行已经提前步入了现代化。有些人的消费与发达国家的上层分子比起来，并不逊色，以致反社会消费愈演愈烈，到处可以看到腐败的华丽。奢靡之风盛行，进口高级轿车满天飞，公宴不停火，带来泪水缸爆

满。消费标准不断提高，并且上行下效，不断由上层向中层、中层向基层蔓延，在上、中、下层社会中反复振荡，并在振荡中得以加强，以致上流社会的高级消费圈与下层社会的温饱世界构成强烈的反差。实施企业法，旨在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可有些单位则搞成了“血缘企业”。西方的暴力文化与中国江湖上的哥们义气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恶性流氓案的温床；西方的冒险精神与中国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旧观念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西方的“进取中的冒险”变成中国式的“攫取中的冒险”，成为不法侵害的培养基地；西方企业管理中的送“红包”一旦到了某些企业负责人那里，就演变成红包滚滚，贪风阵阵；西方的自我至上的价值观与中国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结合在一起，往往使国人见恶不愤，见死不救；西方的个性至上与中国的宗法观念结合在一起，就使得罪犯失去了关系网的束缚，而打击犯罪则备受“关系网”的干扰，神圣的法制被人治亵渎，执法的有缚鸡之力，无杀猴之权，更无擒虎之功。

党风不正，正义失灵。由于党风不正，社会上腐败现象便得以滋生和蔓延。腐败逐渐具有一定的全民族性，全方位性。既有上层的腐败，也有基层的腐败；既有政治生活中的腐败，也有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中的腐败。既有贪官污吏，也有愚鲁刁民；既有猫鼠合流、监守自盗式的腐败，也有逼良为娼式的腐败。在跑步（部）前（钱）进的风气之下，官场上通行市场法则，市场上通行官场法则。一些真诚地为人民谋福利的地方官员，一些真诚地希望搞活经济的企业家，也把良心、党性搁置一旁，违心地加入了送情送礼、陪吃陪喝的行列。就连被称之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也有出卖人格、出卖良心的。在这种全方位的腐败面前，正义失去了应有的灵性和力量。善者失去了信心，恶者充满了喜悦，社会开始失去崇高性，社会道德因无规则状态的蔓延而加速蜕化，导致社会规范荒废。人民的这种压抑和愤懑，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敌视。

综上所述，执政党的党风不正这颗社会炸弹的爆炸当量是相当大的。它的破坏力，可以带来执政党的毁灭。完全可以这样说，最严重的不是谁来打倒共产党，而是我们共产党会不会不攻自破，不打自倒。如果共产党不能有效地消除自身腐败，就难以执政下去了。即使靠高压政策维持一时的执政，也必然是以牺牲民族的发展为代价的。当然，这枚炸弹就像核弹头一样，尽

管具有令人恐怖的破坏力，但在它没有爆炸以前，是可以销毁的。如果我们的共产党不想放弃自己的党纲，不想放弃自己的执政地位，不想让社会动荡害苦了的中华民族再经历一次社会动荡的苦难，就要集中全党全民的智慧，正确地认识自己，从而拿出自我革新的勇气，采取切实的步骤，严肃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有效地消除腐败，用自己的实际作为打破“兴盛—衰落—灭亡”的循环。除此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关于近年来执政党排除头号社会炸弹的反思

面对自身的种种腐败现象，执政党并没有熟视无睹，更没有姑息迁就，心慈手软，而是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一是先后颁发了一系列法规文件，以规范党员的行为。二是坚持不懈地查处了一批又一批大要案件，惩处了一批又一批的腐败分子，上至党的高级干部，下至基层的“土霸王”。三是普遍开展廉政制度建设，用制度来消除腐败现象。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更是把反腐败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党中央从自己做起，带头办实事，做表率，同时展开了以贯彻落实“两高一部”通告为内容的廉政风暴行动。从去年开始，党中央又着手抓纠正行业不正之风。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遏制腐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党廉政建设的作为与我们党内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相比，与广大人民群众渴求解决腐败问题的迫切愿望相比，是不容乐观的。这一点，从我们党反腐败目标的微妙变化中就得到了有力的证明。目标开始叫作争取党风的“根本好转”，后来又提“稳定好转”。现在这些较高的目标都未能实现，就将目标调整为“明显好转”。

这些年来，我们党抓党风的工作并没有放松，而调子逐渐下降，这是为什么？是党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不是。是党没有解决腐败问题的真诚吗？也不是。原因在哪里？这就有必要对我们党抓党风建设的总体思路和若干措施进行一番反思，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找到其中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

第一，用“不要把人们的期望搞得过高，使人感到一抓就灵”的姿态行不行？这些年来，中央抓廉政建设，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不搞运动，不搞过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一套。这个态度是在1989年2月全国廉政制

度建设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来的。对于不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这已经被党自身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因为，一般地说，群众运动有利于摧毁一种旧制度、旧势力、旧习惯。但是，搞群众运动在建立新秩序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群众运动本身就很难规范。而且通过群众运动来解决党的腐败问题，也不可能避免“运动来了，收敛一下；运动过后，故态复萌”的现象。至于“不要把人们的期望值搞得过高，使人感到一抓就灵”这个提法，从廉政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少说多做”来讲，未尝不可，但作为一种姿态，则是不妥的。

首先，这种姿态的前提是不成立的。这种姿态的前提有两个，一是“腐败难免”，二是如有人所说的“总体上看，现在的中国政府，中国的政治，在世界上至少是最廉洁的国家之一”。腐败难免论，自然不值一驳。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确是腐败难免。如果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也要经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过的全过程，那社会主义制度又优越在哪里？共产党又伟大在哪里？何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的腐败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封建王朝，有的也兴盛了几十年上百年，加上苟延残喘，也能生存几百年。我们年轻的执政党，执政不过四十多年，不应当腐败到这般境地。关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这种判断，不仅国际上不会接受，中国的老百姓也不能接受。普通中国人尽管没有出国考察的机会，没有比较，但从各种大众传媒得到的信息似乎不是这样；即使没有任何信息来源，凭直感也会有结论：比现在的中国更腐败的国家，绝谈不上稳定和发展，他们的稳定和发展就变得不可思议。

其次，这种姿态有悖于党和政府的性质。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是集中体现人民意志的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绝无私利可言。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腐败有意见，人民要求打倒贪官，消除污吏，铲除腐败，这些要求是正当的。如果党和政府无力满足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不能集中代表人民的意志，不是党和政府软弱无能，就是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它固有的党性和人民性。人民期望解决腐败问题，不存在期望值过高的问题，我们治理腐败，就是要“一抓就灵”，抓而不灵是不行的。当然，绝对的弊绝风清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党和政府在解决腐败问题上可以无所作为。如果我们在

这个问题上无所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狂潮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第二，靠制度建设行不行？中央在解决腐败问题上，一个主要的思路就是抓廉政制度建设。1989年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廉政制度建设试点和去年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的纠正行业不正之风，都是循着这个思路进行的。用制度规范人、管理人，固然是有效的，但以此作为廉政建设的基本思路则是大可推敲的。

首先，这个思路在逻辑上不够严密。中央在分析产生腐败的原因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初始形态的商品经济与原有的权力集中的旧体制并存是产生腐败现象的重要根源”，“法规制度不完善，缺乏制衡和监督机制，是腐败现象发生的重要条件”。中央对产生腐败现象的原因分析是十分透彻的。既然腐败是新旧体制并存带来的，就应当从体制改革入手；既然腐败是法规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就应当从完善法规、强化制衡和监督入手。但如果把廉政建设的主要精力放在抓制度建设上，显然有违于廉政建设的内在逻辑。尽管制度也属于法规的范畴，但制度绝非法规的主体，充其量只是法规的补充。古往今来，只听说以法治国，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是用五花八门的制度来治理的。

其次，这个思路在理论上是混乱的。之所以提出把制度建设作为廉政建设的重点，有一种强有力的理论依据，那就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改革党的国家领导制度的讲话中的一段话：“制度比人更重要，制度能够起全局作用，长远作用的。制度好了，可以使好人做更多的好事，使坏人不敢做坏事；制度不好，就会使坏人横行无忌，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小平同志这番话，是相当深刻的。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小平同志在这里讲的制度，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主要是指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我们的廉政制度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以此推演出廉政制度建设是轻率的。当然，法律、纪律、制度都是约束“越轨”行为的，但三者的约束力度、约束方式是大不一样的。法律的约束是刚性的，纪律的约束力较法律要弱一些。法律和纪律的约束力都是建立在执法执纪的基础上的，但制度的约束则带有很大的弹性，其约束力主要是建立在人们的觉悟基础上的。违反法律纪律，其定性、定量的尺度是十分明确的，而制度的度量则是相对模糊的。依制度的约束力而论，其约束力的上限就是不能超出法律、纪律的范围，下限就是